

# 对老沈的思念

王义道<sup>†</sup>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北京 100871)

老沈走了，走得很突然，至少对于我是如此。春节我去儿子家过年，心中惦记着老沈，原想初三或初四去看他。知道他住院，但我对他抱乐观态度，相信他能挺过来，甚至过年也许可以回家。不想我到家后的大年初四早上，韩其智来串门，说昨天送别老沈……。我“啊”了一声，后悔不迭，怎么不早点去看望他！

王选说过，中国人对人的称呼很讲究。年轻时称他“小王”，中年以后称“老王”，更老一点，有社会地位了，就称“王老”。他似乎最不喜欢人家称呼他“王老”。对老沈，无论从年资、从地位、从我跟他相差几近一轮的辈分，我都应该称他为“沈老”，我却从来说不出口，总称他“老沈”。因为在我看来，他不老，精神充沛。在他这次住院前，我们在蓝旗营院里聊天，尽管他坐着轮椅，但对各方面时事仍很有兴趣，思维清晰且敏捷。

跟老沈认识，已经超过一甲子了。自1952年院系调整我从清华大学转来北京大学以后。1954年，我提前一年从学生中抽调出来突击学习俄语，担任苏联专家的翻译。给我布置任务的就是老沈，他让我给第一位专家、普通物理教研室和系主任的教学顾问柯诺瓦洛夫当翻译。后来经常与教研室主任虞福春先生、有时候还有系主任诸圣麟先生等人和苏联专家谈话，请教各种问题，主要是当时苏联的一套教学制度，从制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到组织辅导答疑，课堂讨论，考试考查，普通、中级(专业)和专门化实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等各种教学环节，细到口试方式、如何出考题，以及教研室的活动。因为我的

翻译不灵，往往事先还要给我写好详细的谈话提纲，以便我做好准备。1955年暑假，柯诺瓦洛夫回国，我调到光学教研室工作。1956年老沈曾找我谈话，希望我承担系里的教学秘书工作，可能是因为我对这套苏联教学制度还比较熟悉。但是被我婉拒了，我主要觉得自己资历太浅，而且害怕占用太多时间，影响自己业务水平的提高。这事也就算了。那年系里确定戴道生和我赴苏联读研究生，我俩通过考试后，都因不需要进修俄语而留校继续工作一年，第二年才走。在留苏报名填写专业时，我按当时光学教研室主任赵广增先生的吩咐，报了莫斯科大学高分辨率光谱学。当时这个方向是用光学手段来研究核磁矩的。1956年下半年，我作为翻译跟随由曾昭抡、江隆基、黄幸白等人组成的中国高教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连同前后准备与总结，为时4个多月，直到1957年春节。当时饶毓泰先生的外甥丁渝先生从加拿大回国，来我校兼职，与光学教研室郑乐民等开辟了“波谱学”(该译名是由丁渝先生提出的)研究方向，从事核磁共振、顺磁共振等实验研究。我访苏回来后觉得用光谱学手段做核矩研究已经落后，应该改学波谱学(4年后发明了激光，光学手段又吃香了，当时没有这个预见，不过激光原理还是来自波谱学)。为此我曾请示老沈，他表示可以考虑。但当时到高教部改专业手续颇繁，我也不知道苏联哪所大学波谱学专业强，就未办手续。同年3月我被复旦大学周同庆先生借调去担任来自列宁格勒大学宾京教授的翻译，讲授气体放电光谱学专题。这一段经历对我的业务提高很大，我的量子力学就是那段时间补的。宾京教授后来也到北京大学讲过学。1957年下半年我赴苏联，先到莫斯科大学报到。不久，我便打听到列宁格勒大学波谱学很强，便要求转学到

2015-03-16收到

<sup>†</sup> email: wangyq@pku.edu.cn

DOI: 10.7693/wl20150406

那里去。这事必须得到国内正式认可。我就给老沈打了长途电话，得到了他的首肯。这是我留苏三年半唯一一次向国内打电话，印象深刻。当时正逢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周培源先生是副团长，周同庆先生也在其内，我临时去充当翻译。承周培源校长热心与苏联高教部联系，我很快办成了转学手续。

1961年我回国后，波谱学研究方向已归无线电系，我便转到无线电系工作。老沈听说我回来了，考虑到波谱学与光学关系密切，列宁格勒大学又是苏联的光学研究重镇，就要我跟光学教研室举办一次座谈，介绍苏联的光学研究情况，我应命了。不久，无线电系去了十三陵昌平分校，我和他联系就少了。“文革”以后，无线电系又去了汉中分校，更是音信阻隔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决定撤销汉中分校，我们回迁北京。1978年下半年我曾回总校讨论搬迁工作。这时又见到老沈，他说，你们还是回到物理系来吧，你们总是基础科学。我当时也很犹豫。我们波谱学教研室在昌平时，从1963年起就成为兼属国防科委的研究室，开始了原子频率标

准的研制，1964年又开展了激光研究，都做出了一些成果。为此，教研室更名为“波谱学及量子电子学”。后来物理系也开展了激光研究工作，但我们在汉中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波谱学与激光的工作开展不起来，只剩下一个原子频标方向了。“文革”后我多次跑过国防科委，他们不再承认北京大学无线电系是他们的直属研究室，说以前管得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重返北京以后，必须开展基础研究，恢复波谱方向，激光则应该与物理系联合。所以也倾向于回到物理系。回汉中后，经教研室集体讨论，大家都同意回物理系，因为原本多数骨干教师都来自物理系，对系里有感情。我权衡再三，给总校领导写了一封信，表达我们的意见。总校领导表示同意，据说当时老沈在物理系全系大会上还宣布过，波谱学教研室将回归物理系。可是1979年春我回到北京时，由于无线电系的强烈反对，领导只好收回成命，我们继续留在无线电系。

老沈当副校长以后我们反而联系不多，因为我1983年10月出国访问，1985年2月回来，在学校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他已卸任校行政职务，并



1992年吴大猷教授到北大访问时见到他59年前为北大物理系购买的光栅保存完好，感慨系之

去烟台大学担任校长。不过老沈任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时，我是理事，还兼任波谱学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他曾吩咐我做过一些事。1990年以后，北大、清华两校援建烟台大学的教师与工作人员基本撤回，后来成立了“北大、清华支援烟台大学建设委员会”，他退下来了，担任顾问，我则代表北京大学，成为该委员会的副主任（我退下来后亦是“顾问”）。我们差不多隔一年就一起开会，或在烟台，或在北京，每次都能听到他对进一步办好烟台大学的宝贵意见，直到2014年他因病未能出席。我对老沈在烟台大学艰苦创业时所做的贡献及烟大人对他工作精神的赞许和怀念，印象非常深刻。

老沈退下来后，对于中学物理教学非常关心。当时教育部在北大附中办了一个“理科试验班”，作为中学与大学衔接的重要举措，也是培养中学生物理竞赛生源的一个主要训练基地。为举办这个班开过多次会，教育部副部长也参加过几次，这些会，以及学生开班、结业典礼，老沈差不多都参加了，我也曾出席过多次。他在每次会上都有重要讲话，或对办班做法提出精辟意见，或鼓励学生。

2003年我搬到蓝旗营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多了。他和赵凯华教授在编写《北大物理九十年》和《北大物理百年》时要我写了点东西，并问过我一些情况，但更多的是我向他请教。当时我也已退了下来，但因原来的工作关系，还承担了一些任务，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些问题比较关心，写过一点文章。他也看到过我的一些文章，所以我们就对高等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发点议论，我听他的多。2014年初，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织物理尖子班学生在清华大学朱邦芬老师带领下赴昆明做了一次“寻梦西南联大物理营”的活动。这次活动原来是要请老沈去讲话的，但因他年事已高，就让我去讲，我做了三个多小时的《寻梦联大物理人》的报告。准备讲稿时，我请教过他有关西南联大的不少问题，活动回来后向他做了汇报，并讲了联大遗址现状，他听了很高兴。

从跟老沈的接触中我收获良多，最大的感受是他的五个“非常”：

(1) 非常富有正义感。大家都知道他对反右派的态度，他对那种设圈套整人的做法真是深恶痛绝、极端愤懑。他认为“左”风愈演愈烈，与一些人私心作怪有关；他也为自己当年的迟钝、未能尽其所能而自责。

(2) 非常无私磊落，一心为公。1955年苏联的金属物理专家华西列夫来后，老沈本有机会搞业务，但领导要他当系主任助理，他毫无怨言，全身心扑在了全系的行政工作上。此后对CUSPEA和西南联大校友会的琐碎工作，他都是从出以公心，以担当精神自告奋勇勉力工作的。

(3) 非常具有责任心。老沈做每一件事都要尽心尽责，务求做得最好。他曾对我讲起过对中学物理教材的不满，结果他自己组织了一套教材，对初建烟台大学时面临的困难，他更是竭尽全力去解决。

(4) 非常细致务实。这也是他做事极端负责的具体表现。在编写《北大物理九十年》时，对我们年级(1955级)三校合并时每个学生的来历都认真考查了一遍，有人经历稍复杂些，有的是其他学校转来的，他都要弄个清楚明白，务使不出错误。这种细致缜密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现在难以见到了。

(5) 非常惊人的记忆力。如果上面所说是指老沈的品德，那么他的好记性则是一种天生加磨练的特殊能力。几十年以前的事，例如西南联大时的情况，特别是人名，像我们年级的学生名字，我想他与这些人接触并不多，可他都能准确地说出来，甚至一些数目都能精确复述。我比他小11岁，自叹弗如。

老沈的这些品德和能力我不可企及，只能成为一种仰慕！

他走了，但我总不相信。感觉他音容宛在，近在咫尺。我甚至还想上他家里去继续讨教，还有不少问题想跟他讨论。但理智使我清醒，不能了，不能了，永远不能了！